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

——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何俊芳,王浩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至今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古代“汉化”相比,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在内涵上已有了很大不同。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关键词 现代“汉化”;古代“汉化”;天祝藏区;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015-05

所谓现代“汉化”是针对古代“汉化”而言的一个概念。“汉化”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过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现代条件下其内涵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仍然在广泛地使用着这一术语。那么,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究竟指的是什么?现代“汉化”与古代“汉化”有何异同?当今中国社会对“汉化”一词是否存在滥用与误读?如果存在是否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一、何谓古代“汉化”

有鉴于现代“汉化”是一个与古代“汉化”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汉化”的内涵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作对比。

综观我国学者对古代“汉化”内涵的探讨,本文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汉化”是各少数民族主动向汉文化靠拢并改造本民族文化的历史现象;第二种认为“汉化”是各少数民族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动利用汉文化的过程;第三种认为“汉化”是汉族统治者用一系列手段同化少数民族的观点;第四种认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或是由统治者主动倡导,或是在民众中自然而然发生,都表现为少数民族主动地向较高水平的汉文化接近与学习。在以上观点中,前两种观点指的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第三种指的是汉族统治时期,都是由统治者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汉

化”;第四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汉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统治者推动的,也有民间自然而然发生的^[1]。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汉化”问题即是少数民族“汉文化化”的问题。

从学者们对古代“汉化”问题的研究看,历史上少数民族“汉文化化”的具体内容包括“改汉制”(如采用中原王朝的各类典章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从采集业、游牧业转向农业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改汉姓、穿汉服以及婚姻丧葬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的改变等等,即包括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一般而言,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属于表层文化,较易改变,精神文化属于深层文化,一般需要通过教化才能改变。而在古代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中,“儒学”教育及“儒化”是其核心内容。

但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汉化”即“汉文化化”实际上并不纯粹是“以夏变夷”,而是一种互变互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也在不断接纳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先进元素。正如学者姜小莉所言“在每一次少数民族汉化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汉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和发展。”^[2]今天的汉文化实际上也是吸收了很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并通过重新整合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文化。

那么,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与历史上的“汉

收稿日期:2013-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宽容研究”(13YJA850004)。

作者简介:何俊芳,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E-mail: hejf@vip.sina.com

化”是否还具有可比性?过去意义上的“汉化”是以传统汉文化为参考的,而在当代的中国社会,汉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因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及面临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大量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境下,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趋同性完全说成是“汉化”或“汉文化”,还是能够成立?

二、现代“汉化”的内涵——天祝人的表述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一个主要居住有汉、藏、土三个民族的自治县,其人口分别约占全县总人口数22万的66%、32%和6%^[3]。天祝县也被普遍认为是“汉化”最严重的藏区,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土族居民也普遍认为现在自己的生活与他们周围的汉族非常相似,他们在谈论到这个问题时,都会使用“汉化”一词。从笔者的调查可知,天祝人对“汉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讲汉语、穿“汉装”(大众服装),以及大量的“汉式”建筑(楼房)的存在等。在这里,人们把医生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藏医,另一类是“汉医”(实际上是西医)。

在天祝,“汉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藏族、土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丢失和改讲汉语,并且也有相当一部分居民认为讲汉语本身就是“汉化”。因为与过去相比,对于生活在天祝县的藏族、土族居民而言,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汉语,而逐渐遗忘了自己本族的语言^①。藏语在天祝的使用情况如下面的被访者所言:

在天祝县吧,其实藏族和汉族差不多,说藏话的人特别少。在街上很少碰到有人用藏语交流,也就是说,比如我会说藏语,遇到一个人会说藏语的,我们才会说一下(藏语),但是大多数时间说汉语。

就我们天祝的藏族来说,说藏语的越来越少。其实有些村子还说藏语的,关键就是像我们这些人一出来工作,就不得不讲汉语,所以慢慢地藏语就不说了,环境特别重要。

的确,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本民族语言的遗忘就等于舍弃了本民族的部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天祝县的居民把转用汉语即“汉语化”称为“汉化”是恰当的,实际上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具有共同性。

另外笔者注意到,一些人对“汉化”的解释是带

有一定的时间顺序性的理解。实际上,在藏族与汉族趋同的一些现象上,也有人意识到这很难用汉文化对传统藏文化的影响这一原因来解释,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这种趋同的现象就是“汉化”,他们的理由是“汉化”不是谁跟谁更相似,而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即时间性。一位穿着西装的土族受访者声称自己身上穿的是“汉装”,这便是一种“汉化”。尽管他承认西装是西方人的服饰,而非汉族人所发明,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穿西装是“汉化”的表现,他所给出的理由是“人们就是把这个理解为‘汉化’的。应该说汉族地区接受了这个服饰,先是汉族地区穿西装,后来慢慢地其他地区也开始穿了。”

的确,现在在民族地区人们普遍讲的“汉化”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天祝,除讲汉语、过汉族的节日、穿“汉装”(大众服装)、住楼房、使用手机等被认为是典型的“汉化”特征之外,一些人还把“汉化”理解为一种变化的过程。如一位藏族居民是这样理解“汉化”的:“汉化也就是潜移默化的变化吧,比如说我们家就很明显了。我们上面是一家汉族,下面是一家汉族,中间是我们一家藏族,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了。”

另外一个藏族居民比较清楚地讲述了这种“潜移默化”:“汉化是潜移默化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刻意的东西,没有什么是藏族刻意向汉族学的。我所说的‘汉化’不是汉族人强加给我们什么,这个‘汉化’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可能有些人感觉这个是强制性的,但在我们当地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像汉族人家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

尽管人们对“汉化”的理解很模糊并且含义不尽相同,但是正如上面那位藏族居民所言,“潜移默化”是众多居民对“汉化”的普遍看法。

即使人们认为“汉化”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天祝县的居民认为“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有其原因所在,如一位本地藏族居民的解释是“人多力量大吧。我这边五个人,你那边一个人,你一个改变不了什么。五万人(指藏族)和十三万的比例差距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五万人还不纯。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① 根据调查,本地25%的藏族居民已完全不会藏语,会一些和掌握比较好的分别占18.9%和54.5%;土族居民中不会土族语的占39.7%,会一些和掌握比较好的分别占14.6%和45.3%。参见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载《西北人口》2011年第5期。

事情,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是藏汉两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好在现在也都不分什么民族了,把民族都给忘了,不在民族上谈问题。”

实际上,造成天祝地区“汉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杂居格局、族际通婚、教育模式、经济交流等,但人口比例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笔者的调查中,天祝居民对现代所谓“汉化”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除上面所述外,还有人认为在习俗上和汉族相同就是“汉化”,也有人认为汉族与藏族在文化上的交融就是“汉化”,还有人认为天祝这些年的变化就是“汉化”等等。总之,当地居民对“汉化”的普遍看法就是在各方面“和汉族一样”。从我们的实地调查看,实际上天祝县的多数居民,包括汉族居民,并没有太多地审视过“汉化”这个问题,他们只是给藏族人、土族人与汉族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趋同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称而已。但是,人们所说的“汉化”的确反映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少数民族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剧烈的文化变迁过程。

三、现代“汉化”的特征

笔者认为,古今“汉化”相比,二者在内容上既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也体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如果说古代“汉化”具有汉文化单一文化化的特征,现代“汉化”则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的特征。

首先,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化特征。必须承认,在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以改用汉语、过汉族节日等为代表的“汉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快速转型,为适应国家一体化构建及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国家在学校教育及社会各领域开始全面实施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各族民众对汉语文的掌握;另外,随着以电视为主导的汉语大众传媒的普及,随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越来越重视学习汉语、英语等“更有用的”语言,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长对族际交际语需求的增加等众多原因,汉语的普遍使用几乎对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造成了一定冲击,特别是对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使用造成的冲击更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汉化”。随着汉语的使用,汉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无疑也会对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汉族对少数民族也产生着一

定影响。如在天祝地区,藏、土等少数民族会同汉族居民一样过春节、端午节,少数民族青年也会在“七夕”情人节一起聚餐,部分少数民族居民也喜欢收看秦腔、二人转等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民间艺术节目等。

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一些“汉化”表象背后所表现出的“文化涵化”现象^①。如在天祝县,藏族居民视春节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这也被看作是当地藏人“汉化”的又一重要方面。真实的情况是,虽然藏族居民在过汉族人的春节,但却保留了很多本族的传统文化因子,这体现在服饰、饮食、礼仪、宗教活动等多个方面。如他们在过春节时必须要穿藏服,不穿藏服不仅被看作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另外,当地藏族人在过春节时也非常注重各种宗教活动,在整个春节期间,一定要去寺院拜佛,给僧人拜年,要点酥油灯、煨桑、念平安经、叩头等;有的到大寺院里面参加春节期间的“毛木兰”,从事隆重的宗教活动,如正月十四观看法舞,正月十五白天看“晒佛”,晚上欣赏酥油花等^②。尽管由于天祝地区长时间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地的藏族、土族民众逐渐接受了过汉族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更多地只是接受了过春节这种形式,而并不是完全接受了春节中的汉俗。即使他们接受了节日中的某些汉俗,也是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天祝县的藏族居民在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但是春联是用藏文写的,而不是汉字;他们会像汉族人一样吃饺子,但是主要原料为牛、羊肉而不是猪肉。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也普遍存在。就是说,在我国一些民族地区“汉化”表象的背后,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借用汉族文化的某

^① 目前,学界对文化涵化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李安民认为: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参见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从另一种文化中逐渐地获得文化元素并使其适应自身文化的过程和结果。

^② 煨桑,汉语译为“烟火祭祀”或“烟祭”,举行仪式时,在煨炉中燃烧松柏树枝,香烟弥漫中敬献哈达以祭神灵。煨桑原是宗教仪式,在近代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毛木兰”也称正月大法会,源于宗喀巴大师于1409年在拉萨举办的祈愿会,从正月初二起,到正月十七止。酥油花是以酥油为原料做出各种佛像、花草、艺术作品等。

些形式后附加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最后实际上形成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类文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文化。

在这里还需指出,在天祝存在“汉化”、不同文化间相互“涵化”现象的同时,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也还存在着“藏化”的现象。最典型的“藏化”现象就是生活在天祝的汉族、土族也普遍信仰藏传佛教^①。

其次,现代“汉化”具有西方文化化特征。如前所述,古代“汉化”包括我国少数民族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汉文化的吸纳,而与之相比,现代“汉化”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具有更多的西方文化化的特征。

从前述天祝人实际上也是各民族地区普通民众对现代“汉化”的直接感受看,目前在民族地区被普遍看作是汉族的服装鞋帽(如西装、夹克、T恤、牛仔裤、高跟鞋、运动鞋等)、楼房等各种“汉式”建筑以及很多器物等“物质文化”,实际上都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源于欧美的现代文明通过汉族地区向民族地区的扩散,因为处于东、中部的汉族地区使用在前,民族地区的人使用在后,所以才会有西服是“汉族人的服装”这样的说法,这与历史上少数民族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汉化”完全不同。

再以学校教育的内容为例,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中,历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把儒家经典奉为其教育后代的教科书,如无论是官学、私学或书院,都以儒学或发展了的儒学——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4]。而在现代的学校教育中,通过现代汉语所传授的主要内容已不再是汉族的传统文化,除了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类外,“现在学校统编教材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除科举制度后从外国学来的,准确地说这是一整套欧洲知识文化体系。”^[5]事实上,无论是我国的初等、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除少数课程及一些特色专业外,主要传授的都是源于欧美的知识文化体系。“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不是在学习‘汉人知识体系’,只是借用了汉语教材作为这一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因此,用汉语学习的其它知识,我们不应简单地与‘汉化’划上等号。”^[5]

此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6]。目前,我国内地和民族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其他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的许多变化,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各民族包括汉族原有传统文化的冲击,或者说,体现的更多的是“西方化”特征,而非“汉文化化”特征。比如对于传统的天祝藏族、土族居民而言,节俭是一种美德,然而现代的人们已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和丰富的文娱生活,房产、各式家电乃至汽车已成为普通家庭的消费品,有条件的居民开始追求苹果手机、丰田汽车等高端品牌产品,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观念正在慢慢取代着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再如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开始吸收西方的流行文化,他们不仅观看流行的好莱坞影片,现代西方流行的音乐和舞蹈,如爵士乐、街舞等也成为年轻少数民族一代所追求的艺术文化。总之,与汉族地区一样,一些流行的欧美文化也正在逐步改变着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走向。

最后,现代“汉化”具有当代国家主流文化化的特征。所谓主流文化,一般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倡导的、起主要作用的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7]。国家主流文化作为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当政者会主要依靠对传播媒介、价值观念的主导及消费市场的控制等方式来实现。古今“汉化”虽都表现出国家主流文化的特征,但在内涵上却完全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大一统”的正统文化,直到清末,由于历代各族帝王都推崇儒学,把儒家思想奉为其治国圭臬,使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具有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双重属性和功能,因此有很多学者把古代少数民族的“儒化”等同于“汉化”。如美国汉学家何炳棣就认为,对于满清而言,“儒家化”就是“汉化”^[8]。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把马克思

^① 如根据调查,有52.5%的汉族人称自己信仰藏传佛教,有42.1%的汉族称自己不信教;土族中85.4%的被调查者称自己信仰藏传佛教,不信教的占11.7%。实际情况是,声称自己不信教的部分汉族、土族人平时也会去寺院礼佛(参见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西北人口》2011年第5期)。

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文化^①,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非市场经济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文化始终统摄着其他各种文化形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对共产党员也对各族普通民众的思想、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体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走向产生着支配性的影响。如中国共产党对无神论的提倡乃至文革时期对宗教信仰的禁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状况。再如,天祝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传统的藏族社会制度逐渐被淘汰,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天祝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其它广大民族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体上而言,在改革开放前,国家主流文化对中国各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此不多赘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西方外来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对各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凸显,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则相对减弱,但即使如此,国家主流文化依然对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制约作用。

四、结语

不可否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国少数民族在语言使用等方方面面的“汉化”的确存在;但同时必须指出,与古代的“汉化”即单一的“汉文化化”相比,现代所谓“汉化”的内涵中实际上同时还包含着当代国家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乃至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成分,可见这是一个明显被泛化的概念。在天祝县,由于这里的民族关系长期保持着

一种良好的状态,“汉化”一词的泛用并没有对当地的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但在有些民族地区,由于一些人把当地传统文化的流失误解为“汉文化化”并归罪于“汉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民众的不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现代“汉化”一词的含义加以明确,并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那么,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是否面临着更大程度上的“汉化”、“西化”?费孝通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曾认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自己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9]众多研究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结论也表明,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被削弱、文化间趋同性增强的同时,这一过程也“决不是一元论的西方文化的流行化,决不是某种文化的独断化和主宰化”,“而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是取长补短,交流对话,共存共荣,和而不同的全球化”^[10]。的确,全球化的冲击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以及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尊重和保护,各民族自身也掀起了民族文化复兴的高潮,一些民族还借助全球化浪潮使自己的文化走向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我们对自已的文化有“自知自明”,加强民族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就能取得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参考文献:

- [1] 王浩宇. “汉化”研究及其思考[J]. 民族论坛, 2011(11).
- [2] 姜小莉. 满族汉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7(4).
- [3]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1.
- [4] 何俊芳.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05(3).
- [5] 马戎. 汉化还是现代化[J].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2010(63).
- [6] 俞可平.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J]. 学术月刊, 2006(4).
- [7] 卢衍鹏. 主流文化的解构与文化研究的重生[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1(4).
- [8] 何炳隶. 捍卫汉化: 驳伊芙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J]. 清史研究, 2000(1).
- [9]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35.
- [10] 郭建宁. 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56-157.

(责任编辑 马旭)

^①学界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如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可包含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之中。